

数字与教会：近代中国基督教会的调查统计*

周瑜倩（上海大学）

摘要：数字给我们提供了想象的可能和空间，凭借数字，我们就有了把握外部世界的可能性。传统中国并不讲求精确的数字，因此也缺乏数目字管理。但具有西方背景的传教士来到中国传教，将他们的调查统计深刻地应用到了传教工作中，并对当时的传教活动产生了重要影响，其留下的一系列调查统计内容更成为后世对基督教研究不可或缺的资料。因此，本文将从历史逻辑出发，梳理和考察近代中国基督教开展的一系列调查统计工作。由于新教在这方面留下许多记录，因此重点将放在新教方面开展一些大规模的统计活动，来看看当年他们是怎么样对松散的新教教会开展调查？他们取得了哪些数据，对自身治理有何作用？

关键词：调查统计；《教务杂志》；中华续行委办会

有关于中国基督教输入西方近代文化的研究已经相当丰富，但是对近代基督教带来的针对自身管理的一些制度建设，却基本无人问津。近代基督教会的调查统计制度就是一个重要个案。其实，随着近年来有关当代基督教的一些数据问题的讨论甚至争议的出现，不少人已经意识到这种有时与调查结合在一起的统计不仅仅对当时基督教会了解自身状态解决某些问题有用，而且对国家和地方的宗教治理也有重要意义。中国基督教运动的研究也离不开传教士和传教团体所留下的一手资料。这些资料中，有关于调查统计的内容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原《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年鉴》、《中华基督教会年鉴》、《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等，这些资料将调查和统计

* 本文的选题和研究得到陶飞亚老师的启发和指导，谨此致以诚挚的感谢。

结合在一起，不仅关注教会本身的成长，也注重有关于传教发展的其他事业以及中国各地风土人情的调查。它们不断被学者引用于有关基督教的各类研究之中，对了解中国基督教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事实上，新教传教活动注重调查统计由来已久，传教士对于统计的热情在《教务杂志》中已有明显体现。教会早期的统计活动，也为其之后进行大规模的调查统计奠定了基础。那么新教在华传教的调查统计活动究竟是如何开展的？开展的原因和意义如何？笔者将在下文中进行梳理。

一、教会早期的统计活动

传统中国并不讲求精确的数字，而西方来华人士却十分注重调查统计。早在 1833 年出版的《中国丛报》中就已刊有调查统计材料。英国殖民者在占领香港后不久，即在香港进行了人口统计调查，并编有《人口调查报告》。¹具有西方背景的传教士也同样对统计有着巨大的热情。他们十分关心差会在中国的发展，这在传教士所创办的刊物《教务杂志》中可见一斑。

《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是基督教在华创办的一份英文刊物。自 1867 年因“为在工友间互通声息”创刊，至 1941 年迫于战火停刊，断延发展七十四年。²作为一份传教士创办的刊物，其本身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通过对《教务杂志》的阅读和分析，不难发现，杂志中包含了大量不同差会的统计资料。从创刊开始，杂志中几乎每一年都有关于差会的统计数据或表格，尤其是在伟烈亚力主持杂志期间。其中 1876 年有关统计的内容有 11 篇，1877 年则多达 27 篇。以 1877 年的《教务杂志》为例，除了传教士信息、通信等必要栏目外，整整一年的《教务杂志》中充盈着几乎所有在华差会的统计资料。有以差会派别区分的美国浸信会、美国长老会、美国公理会、英国公理会、英国圣公会、柏林妇女会(Lady's Mission)、中国内地会、巴色会等差会的统计资料。也有以地域区分的，如上海和苏州新教差会统计、宁波新教差会统计、杭

¹ 黄兴涛、李章鹏：《现代统计学的传入与清末民国社会调查的兴起》，黄兴涛、夏明方主编：《清末民国社会调查与现代社会科学兴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 年 7 月，第 4 页。

² 崔华杰：《传教士学者与中国历史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上海大学，2011 年，第 12 页。

州传教士协会统计等。在这年的杂志第一期的《香港新教差会统计——1875 年 1 月前香港新教差会史纲》，详细地记录了从 1844 年开始每一年传教士在香港取得的成绩，甚至细致到包括他们所开办的学校新开设了哪些课程，有多少人皈依，各差会分别在什么时候登陆香港等等。传教士所做的在华差会统计无论在数量和内容上，都着实令人惊讶。¹但自 1878 年保灵重新出任编辑之后，伟烈亚力时期占据大量版面的各个差会的统计取消了。²这导致之后几年的杂志中比较少见统计内容。不过从 1885 年之后，我们仍能在每年的杂志中看到一至三篇的统计文章，并在 1900 年之后有增加的趋势。

《教务杂志》中大量的新教差会统计数据对于研究当时差会在中国的发展具有很大的价值。前期杂志中所刊登的统计数据多是福音传播方面：传教站的数量、教堂数量、外国传教士、本地牧师、助手、传道者、受洗人数、圣餐受领者等等。当然也有关于学校的统计数据：学校的数量、学校中男女生的数量。杂志中所见最早的统计数据是浙江新教差会的统计，主要有宁波和周边地区美国浸信会差会、美国长老会、英国圣公会、中国内地会等。“根据上述的统计数据，我们知道在宁波、杭州和附近地区与差会联系的传教士有 30 人，51 个传教站和分站，22 个教会，54 个教堂，4 个受任命的本地牧师，过去一年受洗的约为 180 个，778 个领受圣餐者。”³通过这些，我们可以得知 1867 年浙江地区新教差会的发展状况。到 1869 年 8 月，杂志中已经收入了一份相对较为完整的在华新教差会统计表格。其中包含了北京、天津、、烟台、通州、上海、九江、海口、宁波和杭州、福州、厦门、高雄和台湾、香港、广州多达 50 个的差会统计数据。统计内容也涉及传教士、女性传教士、受诫命的本地牧师、未受诫命的本地牧师、传教站和传教分站、教堂、寄宿学校男女生数量、日间学校男女生数量、圣餐受领者、新信徒数量、慈善资助。这些统计图表和数据为我们展

¹ 陶飞亚：《传教运动的圈内“声音”：The Chinese Recorder (1867-1941) 初论》，张先清编：《史料与视界：中文文献与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 6 月，第 254-255 页。

² 陶飞亚：《〈教务杂志〉研究》，李灵、陈建明主编：《基督教文字传媒与中国近代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年 11 月，第 392 页。

³ Rev. M.J. Knowlton, “A chapter of statistics”, *The Missionary Recorder*, Vol. 1, NO.12, December, 1867, p.139.

现了 19 世纪 70 年代新教在华发展的初步图景。

杂志中开辟有“通信”板块，这是为方便传教士们进行沟通而设立的。其中有不少传教士在上面发表自己对于统计的意见和建议，他们之中有些人对统计事业抱有很大的信心，并乐于帮助教会的统计和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但也有不少传教士对统计并不信任，认为统计对传教事业于事无补。杂志的编辑对于不同的意见也都尽量作出回应：

“教务杂志的编辑：有一句很有智慧的话：‘除了事实，没有什么比数字更有欺骗性。’然而，在清醒的事实中，无论是数字还是事实都没有欺骗我们。但是，我们自己被误导和错误的推导所欺骗。你的数字对那些懂得如何解释它们的人来说是有益的。

您不能再收集更多有关中国基督教的信息？知道他们之间的性别比例也很有趣，他们在社会中的职业，能够读和写的人数等等。另一种信息也会很有价值，并且没有提供的困难。在差会中有多少皈依者作为传道士、牧师、校长、教堂长是有偿的吗？有多少传教士被雇佣为教师或者家庭佣人？又有多少在医院或者印刷厂？”

回信：“我们很喜欢通信者提出的建议，如果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我们很乐意提供这些项目在我们的差会中。与此同时，我们也很乐意收到其他差会的统计数据，我们将尽快将它们出版。”

“教务杂志的编辑：我对统计没有信心，并且拒绝了填写寄给我的表格……我可以进一步的说，你的统计表与我自己所掌握的事实比较，再次证实了我对所有衡量精神工作的企图是谬论的信念。”

回信：“我们绝不是要求完善统计表，我们仍认为这是最接近事实的，并且比没有统计要好很多。”¹

¹ “Statistics of protestant missions”,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Vol 2, NO.10, October, 1869, p.140-142.

这样的交流对于《教务杂志》的编辑改善统计表格的内容具有很大的帮助作用，也能解答传教士对统计所产生的疑惑和误会，帮助传教使团更好地进行下一步的统计工作。同时我们也能感受到很多的传教士都在关心着统计的内容。尽管统计是粗糙的，却是传教使团迈出的重要一步。

1876 年之后的统计相较之前又有了一些改变和进步。差会提供给我们一些可供比较的统计数据，表明差会在不同时期的进展。例如厦门和福州的差会提供了 1850、1860 和 1875 年有关于教堂数量、传教士、本地牧师、受洗人数、本地贡献等方面的统计数据。这使得我们对差会发展有了一个更为直观的对比，能了解它们在 25 年中的发展的情况。

“1850 年，只有 1 个教堂；1860 年，有 4 个传教基地和 4 个教堂；1875 年，19 个传教基督和 20 个教堂。（厦门英国长老会）”¹

并且统计中也开始有关于医疗工作和文字出版方面的数据。

“医疗工作最开始在厦门是 1842 年，有一个医院包含 40 个床位。医院现有两个私人执行从业者，有 3 个本地外科医生和 4 个正在受训练的学生。

一年有 560 个病人；拿药的病人 2458 人，来自社会的所有阶层。

每年的支出是 1000 美元，由外国人和本地人共同捐款筹集；从本地人中收到的数量为 260 美元。”²

1876 年各个地方的差会基本采用这样的形式，1877 年的统计也会对比刚开始传教与当下传教的发展状况。之后的统计内容基本分为四块：福音传播、教育、医学和文字分布，当然每一部分之下又细分了更多内容。

¹ “Statistics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 at Amoy”,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Vol. VLL, NO.2, March-April, 1876, p.111.

² Rev. J. Macgowan, “Medical missionary work at Amoy”,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Vol VLL, NO.2, March-April, 1876, p.111-112.

在当时不同地区不同宗派的联系并不紧密的情况下，这些统计数据的来源主要依靠当地的传教士游历和访问邻近各地的传教分站，再将这些数据反馈给《教务杂志》的编辑，或是填写《教务杂志》编辑寄给他们的统计表格，再将其寄回，由杂志社统一进行汇整。

需要注意的是，1877 年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基督教传教士大会，这次大会对全国的差会进行一次大的统计调查，以便了解当时的传教情况，并方便不同地区和宗派的差会互相了解。

随后召开的 1890 年传教士大会和 1907 年传教士大会也对全国的差会发展做了详细的调查统计。并且我们在对比数据中也不难发现，从 1877 年到 1907 年，新教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在中国工作的团体：1876 年，29 个；1889 年，41 个；1906 年，82 个。¹

早期的调查统计数据方便了不同差会之间的互相了解，也使得传教团体的母会了解到有多少省份还未被占据，有多少省份有专门管区，便于他们做出下一步的安排。同时也能不断看到差会在中国的进步与发展。

但无论是《教务杂志》所刊登的统计数据，还是三次传教士大会所做的调查统计，都存在着一些问题。杂志的统计太过分散，无法系统地收集中国新教差会年度统计数据，统计内容覆盖不够全面，很多也得不到应有的反馈。这导致数据是不完整也是不全面的。而传教士大会召开的间隔过长，导致在华传教士无法时时获得统计数据。并且很多数据的界定也十分困难。“教堂的数量很难说明。如果每个信徒的小团体被称为教会，教会的数量将超过一千。”²因此一个系统而专门的统计机构与负责人，及统一的统计标准就急需被提上日程。杂志中也曾有人提出过这样的建议到：

¹ “Missionary statistics”,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Vol. XXXVIII, NO.5. May, 1907, p.295.

² Rev. J.W. Davis, D.D, “Statistics of protestant mission work in China”, *Recorder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May 7-20, 1890,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P.660.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在询问是否有一些计划无法系统地收集中国新教差会年度统计数据。首先，在我看来，一个人做这个工作是一件太过巨大的任务。因此计划应当是这样：每个人收集他代表的省的数据，然后交给在上海的主席制成一般的表格，放在教务杂志的专栏中。第一个需要克服的困难是委员会的选择和组织。这看起来很长，而且会浪费太多时间，要一直等到下一次传教士大会在 1907 年的召开。因此，我们不能有一个志愿的委员会吗？这是个建议。还有其他人有更好的建议吗？”¹

之后的传教士确实注意到了调查统计的重要性，并由此开展了一些的调查活动，形成了一系列的调查资料，在传教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清末民初大规模调查统计活动

收集和整理传教使团在华传教的全部情况是一项非常巨大的工程，这几乎是一件令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任务。然而，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有人试图着手来完成这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尽管早期已有传教士着手在做传教的调查统计，但这样的统计始终是分散而粗糙的。由于缺乏一个统一的协调机构，基督教新教各个传教使团的信息十分闭塞，相互之间得不到充分的交流，所以人们对于大清末年中国境内的基督教传教情况很难有一个全面的印象。²因此在 1890 年第二次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全国代表大会结束后，在华传教士联盟开始着手编纂一本可随时供人查询和参考的《中国传教使团手册》。此书于 1896 年正式出版，首次向读者比较详细地介绍了 45 个在华新教传教使团的概况，迄今仍具有很好的研究和参考价值。³

1907 年百年传教大会，为了对新教在华各差会的事工有一个更清晰全面的认识，大会的筹备委员会计划编辑一份在华各项社会工作的简明扼要。该书所用的方法与《中国传教使团手册》完全一样，来自加拿大长老会的广学会干事

¹ P.W. Pitcher, “Missionary organization and statistical returns”,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Vol. XXXV, NO.6. June, 1904, p.315-316.

² 本书编委会编：《中国基督教年鉴（1）》，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 年 1 月，第 2 页。

³ 本书编委会编：《中国基督教年鉴（1）》，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 年 1 月，第 2 页。

季理斐被指定为该书的主编，他将要调查的资料以信件的形式发给在华各个差会，然后编辑成《新教差会在华百年史》一书于1907年百年大会前夕出版。¹

1910年，中国的传教士借鉴日本传教使团的做法，开始编纂一部类似的中国基督教运动的年鉴。作为基督教文献出版机构的广学会担负起了编纂的重任，年鉴的主编仍然由季理斐担任。由于中国幅员辽阔，承担起这样一份工作并不容易。1910年出版的第一本《中国传教使团年鉴》前言中也说到：

“日本可能是便于管理的，但是中国地域辽阔。计划书坦诚地承认在中国做和日本一样的事情或许是不可能的。第一个不完美的尝试已经出现在了这本书上，但是我们很高兴地说300个提前的订阅者，给了我们简单的信心，让我们给大家呈现了这样一本书。”²

该书从1910年开始出版，开始时的名称是《中国传教使团年鉴》，之后随着中国教会和基督徒的成长，从1926年起，《中国传教使团年鉴》正式改名为《中国基督教年鉴》（以下简称《年鉴》），一直出版至1941年，共21期。

在《年鉴》出版的过程中，发生过一件大事，那就是1913年中华续行委员会(*China Continuation Committee*)的成立。这是中国基督教会历史上的第一个涵盖各宗派的常设机构，其目的在于为进一步推动基督教在华的宣教事业提供最具参考价值的资料。³由于基督教在西方宗派林立的历史原因，因此随着各国差会入华的同时，也带来了他们固有的宗派主义。1900年前入华的各差会，各自在中国建立自己的差会，基本上互不联络，也没有一个中心的组织。1910年爱丁堡普世宣教会议的召开为中国建立全国性的组织提供了契机。1913年，爱丁堡大会主席穆德访问中国，并在中国主持召开了全国基督教大会，在会中仿照爱丁堡续行委员会的方式成立了中华续行委员会。中华续行委员会成立的

¹ 王德硕：《北美的中国基督教史研究述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3月，第152页。

² “The Christian Movement in China, 1910”, in D. MacGillivray, eds. *The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1910, p.i-ii. (《中国基督教年鉴》(3)，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重版)。

³ 罗伟虹主编：《中国基督教（新教）史》，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4年，第359-360页。

重要目的之一是要开展对中国基督教事业的全面调查，它的出现使得更为全面而系统的调查统计事业逐渐成为现实，笔者将在下文中详细介绍委会的调查事业。

该机构成立之后，就从广学会处接管了《中国传教使团年鉴》的编纂工作，由它负责指定该《年鉴》的主编和编委会成员的人选。这样一直到 1922 年，续行委会完成它的使命。之后，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成立，由协进会继续跟进《年鉴》的编纂工作，直到 1941 年的收官。它向我们展示近 30 年的时间里，中国社会面貌的变化和传教使团在中国所做的种种努力，也让我们看到了这 30 年来，中国教会的发展。正如《年鉴》序言里所说：“它就像一套全面记录和展示在华新教传教使团活动的大百科全书，为我们发掘西方来华传教士和中国近现代史的史料提供了一座丰富的矿藏。”¹

中华续行委会在华成立的九年时间里，不止承担《中国基督教年鉴》的编纂工作，更是将自己成立初期调查的目的和宗旨发挥到极致。1910 年，爱丁堡召开普世宣教会议，会中便提出要进行全面的宣教事业调查。1913 年，爱丁堡大会的主席穆德博士(Dr. John R. Mon)访问中国并主持了一系列会议。在上海召开全国基督教大会后，正式成立中华续行委会。大会中提到委员会应详细调查所有宣教地，印刷各项图表，详记各宣教地点，教堂基督教职员与宣教师，总教徒之大略，以及教会内大小学校、医院，以及各项慈善机关。²委员会下设许多特别委员会，与调查相关的特委会也是最多的。这些特别委员会对中国基督教的现状和国情做了周密的调查研究，最初只是由各差会的传教士分门别类地收集各种与传教相关的资料，为全面调查的开展做一些准备工作。³

早期统计由于没有专门的机构导致统计内容分散和混乱。现在已经设立专门的调查机构，那么调查过程采用怎样的形式进行是委员会所关心的问题。由于中华续行委会与爱丁堡续行委会的关系，爱丁堡续行委会所使用的统

¹ 本书编委会编：《中国基督教年鉴（1）》，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 年 1 月，第 30 页。

² 全绍武：《基督教全国大会报告书》，上海：协和书局，民国十二年五月（1923.5），第 92 页。

³ 尹明亮：《爱丁堡会议与中国教会》，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10 年 4 月 20 日，第 35 页。

计标准成为了中国教会所借鉴的标准。爱丁堡大会的续行委员会通过小组委员会在这一方面准备了一个详细报告，如果中华续行委员会能够确保采用这样统一的程序来报告中国的差会工作的一般事实，那么它将有助于消除现有的混乱条件。¹尽管使用统一的统计表格并不意味着统计的完整，但确实会比之前发表的一般数据要更为精确。调查委员会收集到的统计数据，不仅用于《中国基督教年鉴》，也用于从 1914 年开始出版的《中华基督教会年鉴》，该年鉴是委员会仿照《中国基督教年鉴》出版的，一直出版至 1936 年，共 13 期。与前一种不同的是，它是以中文形式出版。该年鉴编辑之宗旨，其范围仅及于与本会联络之各基督教会，调查其事业效果，及进行之状况，以概括主义述之。²《中华基督教会》所列各种统计调查图表，率多关于西国教士，实以在华西人为数较少，调查尚易，故先就见闻较确者，列成图表，将来更拟于华人方面，精细调查，借资参考比较。³

调查特委会前期的调查工作为 1918 年开展的全面调查做了充分的准备。统计干事司德敷在 1918 年的《中华基督教会年鉴》中提到：

“前次中华续行委员会开年会时，曾决议今日中国教会，应施行总调查，盖以中西教牧之观察，均谓中国传道事业，至今已达一种之程度，足有成绩可调查也。且欧战今已告告终，将来世界恢复和平，对于传道事业，自必益加振奋。”⁴

可见到 1918 年，试办全国总调查的时机已经成熟。1918 年开始的调查涉及范围之广前所未有，委员会的成员也为此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在 1917 年的会议上确定了工作计划，并在第二次会议上批准了收集信息的问卷表格。调查问卷的复印件和其他必需材料在 11 月的第一周一起被散发出去。11 月的最后两周和

¹ “The China Continuation Committee”, *The Chinese Record*, Vol. XLV, NO. 3, May, 1914, p.267-268.

² 基督教会民国二年全国议会组立续行委员会编：《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一期》，上海：商务印书馆，1914 年 11 月，前言页。

³ 中华续行委员会编：《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二期》，上海：商务印书馆，1915 年 11 月，U123-0-1，第 3 页，上海档案馆。

⁴ 中华续行委员会编：《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五期》，上海：商务印书馆，1918 年，第 173 页。

12 月的前两周，秘书访问南方的城市，其目的是希望帮助他们提供有价值的信息。¹之后是收集调查材料的反馈，并将其转录，最后形成图形展示和最终报告。为了获得更多的调查资料，此次调查采用文献调研与发放统计表格、询问表格相结合的方式，²其数据和资料的来源是多方面的。1921 年的年会上报告说会在年底完成英文版本，中文版将在 1922 年初完成。这样可以保证在 1922 年全国基督教大会召开之前，大家都能有时间进行阅读和研究。

全面调查的工作持续了三年，对于中国基督教的事业，以科学的方法、详细的调查；将教会中布道、教育、医药、文学、慈善、等等的工作，详细调查，巨细无遗，不但调查教会事业的现状，更是以此省与彼省的工作比较，以往的工作与现在的工作比较，此项的调查是中国教会前所未有的。³当然，其中的困难也可以想见。在幅员辽阔的中国土地上进行调查，其数据的繁多和庞大就足以分散人的精力。同时为了追求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需要咨询多个来源，并进行多次的检查。加上缺乏中国助手的援助，所需信息难以获得。但这些困难并没有消减委员会成员的热情，最终完成了《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现名《1901-1920 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这一巨作。

1922 年，全国基督教大会召开，中华续行委办会的使命告一段落，中国教会成立了新的组织机构——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它既是中华续行委办会的继续，同时又有新的使命和任务。而委办会存在的九年时间里，在调查统计事业上所做出的成绩已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三、调查统计事业的原因与意义

无论是早期传教士分散的调查统计活动，还是之后大规模、有系统的调查统计，为何传教使团如此热衷于此？调查统计是对事实的一种的考究，于统计学理论而言，统计可以根据过去的事实求得正确的见解，并分析比较以考查往

¹ 《中华续行委办会第 7-9 次年会记录：第七次会议》，1919 年 4 月，第 75 页，U123-0-11-1，上海档案馆。

² 李志英、罗艳、傅奕群：《认知中国：近代中国社会调查的人群聚类分析与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年 2 月，第 423 页。

³ 《中华归主——中华归主运动通告书》，第十六期，1921 年 11 月 10 日，U123-0-60，上海档案馆。

事成败的原因，而定现在事业进行的方针，免得覆辙重蹈。¹这样的理论应用于传教团体的统计活动同样有效。中华基督教会年鉴中曾提到：“统计调查，与教务之进行，均有极大之关系，不有比较，不足以惩前毖后，不有调查，不足以舍短取长。”²传教初期，新教各个宗派分散，大家在各地传教，消息也相对闭塞。早期的统计尽管不够精确，但在一定程度已经反映了当时各个地区各个宗派传教的事实，便于各个差会之间互相了解，清楚自己和其他差会传教发展的程度。将这些调查统计内容传回家乡的母会，也使得他们对中国的宣教事业有所了解，以便制定下一步的传教方针，预测将来传教事业的变迁。通过调查得到的数据也能使传教士清楚自己这些年所做工作取得的成绩，对于激励以后的传道工作亦有很大帮助。并且，这些传教使团不止考察差会发展的状况，也调查中国的风土人情、人口地理等情况。这对于传教会针对中国的特殊情况和现状，制定适合中国路线的传教方针有很大作用。并且，随着中国基督教徒地位的不断提升，华信徒在传教中的作用也日益重要。司徒雷登提到调查事业的开展也能使华信徒知传教事业的重要性，仅仅依靠西宣教师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应各当奋勉，以图教会自立，自行布道，以养成其自行发展之能力。³可见，这样的调查统计活动是十分必要的。正如《教务杂志》中所说：“甚至传教士在研究自己的工作时也不知所措，直到他们的工作记录得到很大的改善。实质性的进步取决于对有关过去和现在环境的事实的准确了解。”⁴

19世纪末20世纪初较大规模的调查统计和1918年的全面调查工作的开展，除了上述原因，也离不开一些必要条件的成熟。首先，基督教在华的宣教事业是一个从分散走向联合的过程。1877年、1890年、1907年、1913年以及1922年召开了五次大规模的传教士大会。其目的就是整合在华传教资源，共同实现中华归主。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有详尽的调查资料。⁵并且传教士大会的

¹ 赵胜忠：《数字与权力——统计的现代转型与中国国家成长》，博士学位论文，南京大学，2012年5月，第78页。

² 中华续行委办会编：《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四期》，上海：广学会，1917年12月，第212页。

³ 中华续行委办会编：《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五期》，上海：商务印书馆，1918年，第174页。

⁴ “The Statistical Secretary”, *The Chinese Record*, Vol. XLVII, NO.6, June, 1916, p.358.

⁵ 参考王德硕：《北美的中国基督教史研究述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3月，第155页。

召开，打破各自差会独立传教的局面，也使得他们更加想要了解彼此。然而光靠传教士大会进行的交流远远不够，需要传教使团手册方便大家查询和参考。这就产生了 1896 年的《中国传教使团手册》，也成为了《中国基督教年鉴》的开端。

其次，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处在一个剧烈变革的时期，其变化日新月异，各个传教使团的发展十分迅猛，如果不及时更新调查资料，就会难以把握基督教在中国发展的态势。因此，一部系统的调查年鉴十分必要，它将帮助传教士和母会及时把握最新的动态，以便更好地传教。加之日本的西方传教使团已经连续八年出版了题为《日本基督教运动》(Christian Movement in Japan)的《年鉴》，给了中国传教士刺激和动力，由此产生了《中国基督教年鉴》。

第三，世界基督教宣教组织的支持。1910 年爱丁堡大会之后，世界宣教事业走向联合，大会上成立了爱丁堡续行委员会，为中华续行委员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其后出版的统计报告也成为中华续行委员会统计报告的参照。¹爱丁堡续行委员会为中华续行委员会的调查统计事业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和帮助。同时，一个统一机构的建立也就为全面的调查事业提供了可能性。加上北美世界布道运动担任所有调查经费，以及宣教会资金的投入，使得传教使团具有全面调查的实力。由此《中华归主》这一 79 万余字的调查巨作能得以实现。

当时进行的调查统计活动，对当时和后世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从上文调查统计的原因我们就能发现，调查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制定传教方针。“这个调查的工夫，是找出全国教会的实情，是找出教会的荣辱。我们大家在这奋起进行，要为全国效力的时候，总要先把全国教会的情形，无分事体的巨细，实情的好的否，全都把他看的了如指掌，然后才得有恃无恐去竭力进行。”²他们能够清楚地看到他们自己差会的工作与其他差会有关的工作，指导他们更有利地分配工程和资金，以及协助他们在中国各地的所有任务的工作中提高效率，协

¹ 参考王德硕：《北美的中国基督教史研究述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年 3 月，第 155 页。

² 《中华归主——中华归主运动通告书》，第十三期，1921 年 6 月 10 日，U123-0-60-43，上海档案馆。

调和平衡。¹其次，能唤醒中国基督徒对这个国家传福音的更大兴趣和更深刻的责任感，中心目标是继续更加迅速和充分的宣教与福音运动。²《中华归主》的序言中也提到：进行本调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加速中国宣教事业的发展，并使之更有成效。本调查的目的不只是为了说明基督教在中国已经取得的成就，同时也要是中国基督教一致化，并提出各教区独具的特点借以评价每个教区的宣教事业。³而调查中采用对比的方式，不仅能从横向看出不同宣教地的事业差别，也能从纵向表明宣教事业的得失。通过对比，便于传教团及时调整传教策略。

而当时处于宣教目的进行的调查统计活动留下的调查资料，成为现今研究中国基督教运动重要的原始资料。无论是《中国基督教年鉴》、《中华基督教会年鉴》还是《中华归主》，我们都能从这些材料中发现当时中国的现状，传教发展的状况以及传教使团当时所进行的活动。加之，中国的统计调查起步较晚，清末统计也未讲求精确化的数字，对考察对象更是缺乏较为深入的分析。社会的动荡也使其缺少系统的社会调查。因此，传教士的调查活动也起到了补充清末民初中国发展动态的作用。

《中华归主》一书出版，因这些调查材料不仅显明了基督教在华发展势力之迅猛（由本世纪初的 8 万人到 20 年代初发展为 36 万），而且还表明了基督教的最终野心是要“占领全中国”。这也引起了一些原本就对基督教无好感的知识分子更大的反感，由此引发了第一次非基督教运动。⁴但抛去传教士的宣教野心，就调查统计本身而言，它对当时中国和基督教运动发展的帮助以及后世的研究具有肯定的价值和意义。

¹ 《中华续行委员会第 7-9 次年会记录：第七次会议》，1919 年 4 月，第 72 页，U123-0-11-1，上海档案馆。

² 《中华续行委员会第 7-9 次年会记录：第七次会议》，1919 年 4 月，第 72 页，U123-0-11-1，上海档案馆。

³ 中华续行委员会调查特委会编，蔡永春、文庸、段琦、杨周怀译：《1901-1920 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原《中华归主》修订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年，第 9 页。

⁴ 参考段琦：《奋进的历史——中国基督教的本色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年 5 月，第 180-181 页。

从配角到主角：两次百年纪念大会上的中国声音

赵碧芳（上海大学）

摘要：1907 年在新教入华一百周年之际，中西力量对比已出现明显的变动迹象。传教士在上海举办了在华百年传教大会，兼具纪念百年传教成就和讨论在华传教事务双重意义，传教士邀请中国官方代表和资深的中国基督徒参与各类纪念活动，中国方面也借此机会表达了自身立场和观点，呈现出中外辑睦的良好形象。但在上海百年大会上缺乏具备投票权的中国代表参会引发中国基督徒的不满和质疑。在教会自立程度较高的广东，一批深具民族情感和爱国热忱的基督徒领袖决定自费自办华人纪念大会，地方官员也给予大力支持。中国基督徒在两次大会之间实现了从配角到主角的身份转换，也用行动向各方展现了自身能力和独立承担教会事务的强烈意识，为中西新教权势建制的形成提供了早期探索。

关键词：在华百年传教大会、华人百年传教纪念大会、中国基督徒、传教士、官教关系

19 世纪后半叶，伴随着条约体系的建立，宗派林立的新教差会纷纷来华开拓教务，但差会间各行其是的传教活动阻碍着传教事业的有序发展，为此在华传教士曾于 1877、1890 年召开过两次大型跨宗派大会，借此平台交流各自的传教经验，规划未来传教策略与方向。原计划于 1900 年举办的第三次传教士大会因义和团运动爆发等众多因素而推迟，传教士在集体讨论后决定于 1907 年新教来华传教一百周年再次举办，兼具纪念在华百年传教的意义，因此此次大会的正式名称为“在华百年传教大会”（China Centenary Missionary Conference）。

虽然此次大会具有双重性质，但是以往研究主要围绕大会各项议程展开，着重于将其与前两次大会进行对比，并探查其对此后在华传教事业的影响，针对传教士、中国基督徒开展的各类纪念活动的关注度尚显不够。同时因为缺少具备投票权的中国代表参会，与会的中国访客数量很少，研究者普遍认为虽然此次大会将传教士与中国同工的关系定位为“同事”，但传教士仍居于一种指导者的位置。¹“中国基督徒由于缺乏传教士的信任，即使他们有领导能力，也很少得到锻炼的机会。”²这些观点的确反映了当时中国基督教发展的部分实相，不过由于以往研究主要基于传教士的话语体系，即当时的英文大会记录，缺少中文史料和中国基督徒的相关文章，因此没能注意到存在于二者间的暗潮涌动，也忽视了中国基督徒面对此种状况曾作出的反应以及他们在百年纪念活动中发挥的作用。

裴士丹教授提出的“中西新教权势建制”概念是我们理解 20 世纪前期中国基督教史的重要线索，那么这一建制在 20 世纪最初十年经历了怎样的形成过程？在华百年传教纪念活动便是一个重要的切入点，当时不仅有传教士在上海举办的百年传教纪念大会，广东基督教人士也组织了华人纪念大会。对两场纪念活动的深入研究有助于我们认识传教士在这段历史中所做的贡献之外，了解基督教中国化进程中中国基督徒、中国官员乃至社会各界所做的努力，并增进对这一时期基督教在华发展态势的认知。

一、日益壮大的传教事业与中国基督徒的成长

义和团运动后在华传教士开始更多的反思条约特权的危害，在与官府往来时态度大为收敛，吸纳信徒也更加谨慎，同时传教士在教育、医疗、救济慈善等社会事业上投入更多关注，传教版图也拓展至内地各省，基督教进入在华发展的“黄金时期”。社会的进步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新教差会和传教士来华开拓

¹ 张珺：《“在华教会”与“中国教会”——以三次传教士大会为平台的讨论》，《基督教学术（第 7 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第 87-118 页。

² 刘家峰：《从助手到领袖：1910 年代的中国基督徒——以诚静怡为中心的考察》，《社会科学研究》2007 年第 2 期，第 494 页。

传教事业，到 1905 年前后中国成为传教士首选的传教地区。到在华百年传教大会召开时有 82 个差会团体在华传教，传教士达 3833 人，受餐信徒 18 万人，被按立的中国牧师有 345 人，未受按立者 5722 人，中国基督徒的奉献数达到 30 万余银元。¹

相比从数量上直观感受教会的发展，当时中国基督徒质量也有所提升。传教士注重培养教会的自养能力，入教者虽然还是以受教育程度低的下层民众为主，但逐渐摆脱以往“吃教者”的形象，并且上海、广州等沿海城市还存在一批“基督徒商人”和“基督徒知识分子”，有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效应。中国教牧人员的增长也有利于更多基督徒领袖出现，虽然这一时期的基督徒领袖往往是在地方社会具有影响力的教会人物，全国乃至国际性的领袖人物要等到民国以后才能出现，但是他们已不愿事事仰赖差会和传教士，试图争取更多自主性。

20 世纪最初十年，不断加深的民族危机使得国人对于西方人和西方文明持有一种复杂心态，民族主义意识高涨深刻影响着中国基督徒的思想观念，教会内部的中西隔膜也愈加严重。中国基督徒既不满于传教士对教务的控制，也欲表明自己的爱国热忱。义和团运动后民教冲突已大为减少，但偶有发生的教案问题还是令中国基督徒感到国家主权遭西人干涉，自身也遭受误解，这成为推动中国教会自立的核心因素。1902 年高凤池、宋耀如等人在上海组织中国基督徒会主张教会自立，原因便是不满于“辰州教案”的处理结果，想要“以爱国爱人之心”“妥筹预弭教祸之法”。²1906 年俞国桢发起的中国耶稣教自立会也申明是“忧教案之烈，悲外患之亟”，强调其“爱国、爱教”属性³。

面对中国教会的自立运动，传教士有着复杂心态，差会内部对此也多有争论。一些传教士虽然意识到教会最终将由中国人管理，但又认为当时的中国教牧人员能力不足，尚未达到完全自主的程度，不愿将权力转交给中国人。一些

¹ Missionary Statistics,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May, 1907, p.295.

² 《中国基督徒会小启》，《中西教会报》，1903 年 4 月，第 14 页。

³ 《追录鼓吹自立会之缘起》，《圣报》，1924 年 7 月，第 2 页。

差会和传教士则认为教会自立是传教事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自然结果，很早便开始了培养中国本土教牧人员的尝试，并积极支持和推动中国教会走向自立。

由于传教士的理念差异、基督教传播的地域差异以及中国基督徒成长状况各异，因此中国教会自立情况也各有不同。广东是基督教传入最早的地区，在广东开展传教事业的长老会传教士汲约翰、浸信会传教士纪好弼、湛罗弼等都致力于推动教会自立，因此广东地区的教会自立程度相对较高，在 19 世纪末便开始自主办教的尝试。1872 年陈梦南积极联络海外华侨筹集资金，组织粤东广肇华人宣道会，这是最早的国人自立教会。19 世纪末两广华人浸信会组织成立联会，张立才成为首任干事。进入 20 世纪后，广东基督徒的自立活动更为频繁，1903 年多位教徒在华人宣道堂集会，决议以宣道堂为母会，另组“兴华自立会”为子会，选举冯活泉为会长，廖卓庵任会吏。¹不过自立教会并不意味着要完全与差会和传教士断绝联系，1906 年黄旭昇等人在广东也效仿中国基督徒会组织广东基督徒会，但强调参与者不用离开母会，而且“若兄姊欲入会，必要母会有荐书本会方允收纳。”²可知广东基督徒的在追求自立的同时也努力与传教士和差会保持良好合作。

除了教会内部的关系变化，进入 20 世纪后，官教关系也面临新的形势。“在清末新政的背景下，官教互动成为常态。”³在华传教士的根本目标是广传福音，为此他们需要与官僚阶层保持良好的交往，为传教活动提供便利。传教士在举办一些重要活动时常常会邀请当地官员出席，如 1907 年山东省所有的高级官员以及 50 余位中级官员出席了济南府的英浸会共合医道学堂（English Baptist Institution）开学典礼，传教士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在典礼上发表演讲。⁴在 1907 年上海举办的青年会第五次大会上，两江总督端方也

¹ 罗伟虹主编：《中国基督教（新教）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4 年，第 321 页。

² 《外教人论羊城基督徒会之成立（附黄旭升先生致本馆函）》，《通问报：耶稣教家庭新闻》，1906 年第 214 期，第 1-2 页。

³ 陶飞亚、李强：《晚清国家基督教治理中的官教关系》，《中国社会科学》2016 年第 3 期，第 200 页。该文也涉及到此次尚贤堂欢迎会的内容。

⁴ （美）丹尼尔·W.费舍著；关志远等译：《狄考文传：一位在中国山东生活了四十五年的传教士》，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 118 页。

曾派员出席。政府官员对于基督教的态度对于民众有着重要的示范和导向意义，传教士一方对于当时的官教关系非常满意，认为“民教辑睦，帖然相安，内而政府，外而疆臣，亦皆保护臻至，约束极严，不令其下稍有蠢动。”¹

地方各级官府也有众多具备留洋经历和交涉经验的官员，以往被看做是反教主力的官绅阶层对传教士和基督教的态度大为转变，他们都非常注重与传教士维持良好的关系。当时的直隶总督袁世凯、两江总督端方、两广总督周馥都是著名的开明官员，他们不仅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对传教士进行保护，也多次上陈处理教务问题的奏折、发布政令并组织编撰相关书籍。²不过对中国官员而言，与传教士的交往毕竟是因应形势之举，当中国基督徒提出教会要自立自养以消弭民教冲突时，官员不论是基于自身的民族情感还是维护辖境治安的客观需要都会支持中国基督徒的行为。1906年俞国楨在建立耶稣教自立会时便请求官府立案保护，并强调“中国耶稣教自立会之设，意在尽除民教嫌隙，即遇有民教词讼一以和平办理，不假外人分毫之力。”³这种将容易引发中外交涉的民教冲突转变为内政问题的设想无疑与地方官员的诉求相契合，上海道瑞澂多次发布告示对其予以保护。

在百年传教大会召开之际，如何纪念百年传教成就，推动在华事业进一步发展成为当时西方传教士与中国基督徒的关注焦点。对于在华各差会和传教士而言，此次大会既是对百年传教的纪念，还是向母会和各国传教士展示其传教成果的机会，并且在纪念活动之外最重要的是讨论各项在华传教事务。在华传教士努力呈现中西融洽的情景，但此次大会并没有为中国代表留下席位，这成为后来深受垢病之处。对中国基督徒特别是成长起来的中国教牧人员来说，借由在华百年传教纪念活动，他们想要向传教士和差会展示自己的能力和此后在教会内部提高自身地位而努力，同时基督徒也要向中国社会展现自立自主的形象，扭转社会对于教徒和基督教的偏见，因此他们对于能否参与并以何种方

¹ 《论基督教百年大会辑睦中外之大旨》，《大同报》，1907年第10期。

² 如袁世凯1901年在山东颁布《保教简明章程》，1904年在直隶发布《各州县教案简明要览》、周馥在1905年编撰《教务纪略》等；《各省近事：外交：编定传教约章摘要》，《秦中官报》，1907年12月，第33页。

³ 《道示照录（为设中国耶稣教自立会事）》，《申报》，1906年3月31日，第17版。

式参与纪念活动非常在意。对于地方官员而言，在华传教百年大会是一次国际性会议，他们需要向世界各国展示其开放包容的形象，官教双方长期的良好互动也使众多官员深度参与到传教士组织的各项活动中来，同时官员对于中国基督徒自办华人纪念大会的想法也乐见其成，并及时提供帮助。下文将对此进一步展开叙述。

二、 上海纪念大会上的中国声音

上海作为新教在华传教事业的基地，各差会在华总部多设在此。在百年大会召开前上海的传教士们积极参与各项筹备事宜，也组织了众多纪念活动，其中最为盛大的是李佳白（Gilbert Reid）组织的尚贤堂¹欢迎会。对于以推动“中外和洽民教辑睦”为己任的李佳白来说，此次大会无疑是展现成果的难得机会。1907年4月27日下午，欢迎会在尚贤堂花园内举办，到场传教士有600多名，除在华传教士外还有来自英、美、加、法、德等国的母会代表和访客出席，尚贤堂方面的到场者有商约大臣吕海寰、上海道台瑞澂以及其他尚贤堂董事，包括朱葆三、吴少卿、陈润夫、叶明齐、杨信三等，此外还有上海县李大令、英法两会审公廨谘员也出席了欢迎会。李佳白等人还曾邀请盛宣怀，但他因事并未出席。²由于尚贤堂在社会上颇具影响，同时此次欢迎会规模盛大，因此从筹备到举行都备受关注，众多中英文报刊都进行了报道。³

尚贤堂欢迎会最为引人注目的是直隶、两江、两广总督，江苏、浙江巡抚均派代表出席。百年大会举办地上海正是两江总督端方的辖境，他对基督教的

¹ 尚贤堂是传教士李佳白最初于北京创办的社会团体，原名上层社会布道会（Mission Among the Higher Classes in China）。它“面向中外上层人士，以协调中外关系，调和中西文化冲突为目标。”因此非常重视与中国官绅阶层的交往。义和团运动后，尚贤堂在张之洞、盛宣怀等官员的支持下迁往上海，并进入发展的黄金十年。

² 《麦葛老李佳白朱葆三等致盛宣怀函》，1907年4月23日，《朱葆三史料集》，宁波出版社，2016年，第197页。

³ 尚贤堂方面专门出版了记录会议内容以及几位代表发言的小册子，上海的《申报》、《时报》、《新闻报》、重庆的《广益丛报》；英文报纸《字林西报》、《北华捷报》以及具有基督教背景的《万国公报》、《通问报》、《教务杂志》，还有一些西方差会报刊都对其进行报道。

态度无疑备受瞩目。¹由于唐元湛²此次是以端方代表的身份出席，所以在有关这次欢迎会的报道中多未指明他与尚贤堂的密切联系，但实际上唐元湛与李佳白有三十年的交情，并任尚贤堂董事二十余年，在李佳白两次返美时也始终由他来承担尚贤堂各项公务。他的官私身份都是代表端方参加这次会议的不二人选。³袁世凯派遣的代表钟文耀⁴是非常有外交经验的官员，当时负责处理洋务事宜。周馥派遣的代表为包家吉，有关他的资料较少，但目前可知他曾参与处理“马嘉理事件”，也是具有处理外务经验的地方官员。浙江巡抚张曾敫代表为世增。⁵世增对于教务问题非常熟悉，1906 年法国限制教权，中法商约修订在即，张曾敫曾代世增上奏整顿教务清单，希望借此机会与法国“订定焦律，减损教权。”⁶江苏巡抚陈夔龙代表为陆钟琦，其与传教士相关的资料较为缺乏。地方督抚如此集中地派遣代表出席传教士集会，代表们普遍具有留洋、出使及对外交涉的经历，这都表明新教进入中国百年之际官教关系早已不同往日。

欢迎会上几位官方代表多使用外语致辞，“江督直督所派代表钟唐两观察操英语，浙抚代表世观察操法语演说尤为特色。”⁷对于参与此次欢迎会的西方人士而言，这批熟谙外语、娴于外务的中国官员出席也预示着未来官教关系将向更好的方向迈进。由于此次集会旨在促进民教辑睦，所以几位官员的发言多是赞扬基督教在华的百年成就，不过从中仍可以感受到官方对如何处理民教冲突的理解。

钟文耀向与会人员介绍了袁世凯在处理民教问题上的成绩，他希望在百年纪念之际，“诸教士有鉴往事，研究其启人误会之由而随时改良，我国家亦自治其民坚明约束。”在钟文耀看来民教辑睦是需要中西双方的各负其责共同努

¹ 大会期间《北华捷报》还发表了名为“总督与大会”的文章，认为端方一向对所有为中国民众谋福利的外国人及其工作表现出善意和礼貌，并详细叙述了端方与传教士之间长久以来的良好互动。参见：The Viceroy and the Conference,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April 26, 1907.

² 唐元湛为第二批留美幼童，1905 年曾随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后端方任用他为驻沪接待外宾专员。

³ 《纪本堂董事唐露园先生事略》，《尚贤堂纪事》，1922 年第 13 卷第 1 期，第 38-39 页。

⁴ 钟文耀是清末第一批留美幼童，曾担任清廷驻美使署通译官、驻日使官二等参赞、北洋洋务参赞。

⁵ 世增为京师同文馆法文学生，曾出使英、法、俄等国，后任浙江洋务局差使。

⁶ 《浙江巡抚张曾敫奏道员世增条陈整顿教务缮具清单据情代奏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合编，《清末教案（第三册）》，中华书局，1998 年，第 871-874 页。

⁷ 《尚贤堂开欢迎耶稣教士会纪盛》，《申报》，1907 年 5 月 18 日，第 5 版。

力才能实现。世增在发言中表示自己非常认同李佳白在《民教相安议》中的观点，认为该书“于西教士则谓宜遵礼貌于华人，习教者则谓当守法律此律己之严也，于平民则毫无畛域之分，于官长则自尽交际之道，此待人之恕也。”¹此外商约大臣吕海寰和上海道台瑞澂也发表致辞，他们分别任尚贤堂议董会长和董事，二人的双重身份正是当时官教调和的最佳展现。瑞澂的发言也认为只有民众遵守法律、传教士不妄加干涉、中国官员秉公办理，在三方的共同努力之下才能达到民教相安的效果。²这与世增等人的观点不谋而合，可见当时的官员阶层对于民教问题颇为熟稔，他们对此已经形成一种普遍认知，并且官教双方对此看法也趋向一致。

面对中国官员的发言，百年大会主席汲约翰在答词中强调传教士一直以来视华人为友，他认为传教士与中国官府在慈善、教育事业上可以展开进一步的合作。李佳白在欢迎会上发表了简短致辞，他随后便在西方差会杂志上发表长文介绍此次集会，并更为明确的表明了他的想法。他认为中西双方虽然在民族、宗教、种族、风俗习惯、仪式等方面都存在差异，但仍可以基于友好和尊重的态度相互交往，认为传教士在打破偏见、误解和怀疑方面做得努力最多，并且已得到一些人的认可。³此次欢迎会也证明这样的尝试是非常成功的。教务杂志评价此次尚贤堂欢迎会时认为，李佳白的工作中最有影响力的部分便是他的社会交往，这有助于培育中外人士的友谊，化解许多人的忧虑，并且通过促进官员对传教理念的理解而更好的推动传教事业的进步。⁴

除了尚贤堂欢迎会之外，当时还有各类欢迎活动在会议期间穿插进行。在 4 月 26 日上海传教士协会筹备的欢迎会上，两位中国人出席并致辞，其中一位是中国牧师张葆初，另一位便是上文提到的两江总督端方的代表唐元湛。⁵在传教士看来，“有一个像端方总督这样的人派代表来欢迎传教士和基督徒，这是对

¹ 《尚贤堂欢迎耶稣教士会纪事》，《万国公报》，1907 年第 223 期，第 92-99 页。

² 《尚贤堂欢迎耶稣教士会纪事（续前）》，《万国公报》，1907 年第 224 期，第 325-329 页。

³ Rev. Gilbert Reid, D.D., "A Social Function in China", *The Christian work and the evangelist*, 1907, p.374.

⁴ Exception to the centenary missionary conference by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Jul., 1907, p.393.

⁵ Inaugural Reception,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May, 1907, pp.284-285.

他们劳动的极大认可，标志着中国新教历史上的一个美好时代。”¹一些大的教派也组织了社交聚会以加强了中外基督徒的交流。4月30日中午后，伦敦会的当地代表和朴脱（W. H. Poate）夫人在联合礼拜堂大厅举办招待会，款待伦敦会和美部会的母会代表和访客。同一天晚上，200多名长老会教徒以社会身份在北京路的特派记者招待所聚会。并且卫理公会、浸信会和圣公会教徒也有类似的集会。²此外上海基督徒商人也组织了欢迎活动，5月3日商务印书馆邀请650名大会代表和访客参加午宴。³他们以行动展示了中国基督徒的成长。

以往由于中国代表的缺位，研究者普遍认为此次大会是西方传教士在唱独角戏，在开会前中国基督徒也意识到此次纪念大会缺少华人参与：“兹闻赴斯会者，皆系久于中国之西人，而华人无分也，盖一切所讲者，俱系英文故也。”导致中国人缺席的因素将在下文详细论述，不过中国基督徒虽然不能以正式代表的身份出席，但还是努力参与并展现对此次纪念活动的支持。在开会当天上海各教会牧师及有职人员佩戴欢迎徽章在青年会所门前站立，并请中西书院、清心书院、约翰书院的学生身着戎装奏军乐，欢迎传教士的到来。⁴

虽然没有为中国基督徒提供参与百年大会讨论决议的资格，传教士还是积极邀请了一些在各领域德高望重的中国基督徒出席大会相关议程。4月27日下午是围绕“中国教牧人员”这一主题的讨论，一个中国牧师代表团应邀来到讲台上，潘慎文（A. P. Parker）将代表团介绍给与会的传教士，明恩溥将这一内容翻译成官话。潘慎文明确表示中国牧师绝不是传教士的助手或者手下的人，而是传教士的同事。两位中国牧师代表发言，一位表示令他感到惭愧的是，经过一百年的发展中国教会仍然像个小孩子，然而独立精神在中国正迅速发展。另一位牧师感谢传教士对中国人的教导，他希望中国人可以承担起他们的责任。他说，广州的许多差会都在建设自立教会，他期待可以短时间内形成一个宏大

¹ Rev. George S. Miner, M.A., China Centenary Missionary Conference, *Northwestern Christian Advocate*, June 12, 1907, p.7.

² Social Gathering,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May, 1907, pp.288-289。

³ George A. Stuart, M.D., “China Centenary Conference”, *The Christian Advocate*, June 20, 1907, p.21.

⁴ 《百年大会预闻（本埠）》，《通问报：耶稣教家庭新闻》，1907年第244期，第247页。

的中国基督教会。¹到新教在华传教百年之际，传教士与中国教牧人员的关系已经发生重大转变。²虽然大会讨论中传教士们对于如何看待和处理双方的关系仍然存在很大争议，但在面对中国教牧人员时传教士还是承认中国教牧人员地位的上升，中国牧师的发言也表明了他们的责任感和承担更多教会事务的诉求。5月1日下午，在“妇女工作——教育”主题的讨论中，中国女子教育先驱阿德希女传教士在世的年纪最大的学生曾兰生（Tseng Lai Sun）夫人出席。³曾夫人也是最早从事教育工作的中国女性。

沈毓桂生于1807年，与马礼逊入华年份相同，因此极具纪念意义，他长期担任《万国公报》的华文主笔，是当时深具影响的中国基督徒。在百年大会开会前，林乐知、李提摩太等人到沈毓桂家中邀请他届时诣会，“指陈同人开会宗旨，兼阐发耶教善与人同之宏愿，俾教外望道未见之士，藉余作一识途老马，引之入胜。”⁴可见，传教士们邀请资深的中国基督徒参会的主要目的在于展现传教成果，并引导更多的中国人信教。但是由于沈毓桂不小心摔伤必须卧床休养因而缺席大会，不过他还是在《万国公报》上发表颂辞纪念大会的召开。他在文中详细阐述了新、旧教的区别以及新教的宏愿，其意也与传教士们的想法相契合。5月2日上午，大会专程委派由丁韪良、林乐知、范约翰组成的委员会答谢沈毓桂致大会的问候。⁵由沈毓桂与传教士们的此次往来可以看出，虽然此次大会没有中国代表，但是资深的中国基督徒还是可以通过一些特殊途径发挥他们的影响力。

5月7日，在有关“传教士与公众问题”的讨论中，唐元湛道台又一次受邀出席，大会主席汲约翰认为这是传教史上第一次有中国官员在这样的场合谈论

¹ The Chinese Ministry, *Record of China Centenary Missionary Conference*, p.471.

² 刘家峰：《近代中国基督教运动中的差会与教会关系概论》，《中国基督教区域史研究》，巴蜀书社，2008年，第49页。

³ 曾兰生（1826~1895），又名曾恒忠，祖籍广东海阳，被认为是比容闳更早赴美留学的中国人。1850年与印尼土生华人路德·亚德（Ruth A-tik）结婚，出席百年大会的应是路德·亚德。详见：Edward J. M. Rhoads, “In the Shadow of Yung Wing: Zeng Laishun and the 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Feb., 2005, pp.19–58.

⁴ 沈毓桂：《拟玛礼逊纪念百年大会记并颂》，《万国公报》，1907年第219期，第49页。

⁵ Abstract of Proceedings, *Record of China Centenary Missionary Conference*, Shanghai: Methodist Publishing House, p.XXVII; A Graceful Greeting,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Sep., 1907, p.517.

传教士与中国政府的关系。与前两次偏于赞扬和恭维的致辞不同，在此次发言中唐元湛更为清晰的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首先称赞了传教士过去取得的成绩，接着便转而批评过去传教士对武力的依赖，唐元湛直言除非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传教士不会再利用条约权利开展传教，否则会对传教士的工作和努力产生压倒性的负面影响。唐元湛建议传教士应放弃自身优越感，加强与中国人的社交往来，并以祖先崇拜为例加以说明传教士对于中国儒家文化缺乏了解。¹唐元湛的发言对过去民教矛盾的根源进行了剖析，并向传教士提出建议，这与尚贤堂欢迎会上几位官员的意图相似。在多年后尚贤堂对唐元湛的悼文中还特别提到了他在百年大会上的演讲场景：“先生以中西交涉，我国割地赔款，多由教民肇衅，乃将耶教博爱与孔教汎爱宗旨，本非枘凿，洋洋洒洒，演说数千言，更劝以勿因小故而酿大祸，袒教民而伤感情，西人多为动容。”²此次对话也有助于中外传教士理解中国官方对待基督教和传教士的态度，以进一步调整未来的传教策略。

除以上受邀出席此次纪念大会的中国人外，当时的中国基督徒以至普通民众也可以参与相关纪念活动。大会期间有不到 20 位中国基督徒作为访客参会，这些中国人的具体信息我们目前难以一一获知，但其中也有余慈度、陈维屏等此后中国基督教史上的重要人物。大会期间，每晚还有知名传教士进行公众演讲。³不过由于英语演讲的受众面有限，因此每晚同时有人在青年会所用华语演说，在这些演讲中还会向听众介绍百年大会的相关决议⁴，普通的中国基督徒和民众也可以及时获知大会信息。4 月 27 日为礼拜日，大会专门组织了公众会议，这被认为是“与百年纪念大会有关的最有趣和最鼓舞人心的会议之一”。当天下午便有 1800 名上海基督徒、学校学生等聚集在市政厅参加会议。⁵

中国人的出席为百年大会增添了不一样的色彩，也给传教士们留下了深刻

¹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Record of China Centenary Missionary Conference*, Shanghai: Methodist Publishing House, pp.734-738.

² 《纪本堂董事唐露园先生事略》，《尚贤堂纪事》，1922 年第 13 卷第 1 期，第 38-39 页。

³ 《百年大会演讲纪题（本埠）》，《通问报：耶稣教家庭新闻》，1907 年第 245 期，第 3 页。

⁴ A Chinese Meeting,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May 3, 1907.

⁵ Meeting of native christian,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May, 1907, p.280.

影响，他们在撰写与百年大会相关的文章时往往都会特别提到这些细节。¹中国基督徒、官员乃至更广泛的普通民众通过百年大会这一平台，与世界各地的著名传教士直接接触，有助于增进双方的相互理解。但是缺少中国代表这一问题还是会影响传教士与中国基督徒之间的情感，对于华人没能参会这一问题，当时的中国基督徒便颇有微言。

《通问报》上有关于大会的连续报道，并在大会召开前发表了署名知白子的时评：“此次百年大会，非为纪念传道于他国。乃为纪念传道于中国。何以西人皆奔走皇皇，经营数载以成此大会。独我华人阒然无声不发一言。垂手乐观其成。”²这一批评在中国基督徒间引发众多讨论，随后彭启峰在《西人百年大会之感情》一文中强调了这次大会对中国基督教发展的重要意义后指出：“惟此次聚会均用英文，中国教友不能与分，有谓华人程度过低，资格未及，且语言不通，无裨实济，于是物议纷然，殊于同力合作义务，颇滋障碍。”³两篇文章虽在最后都指出中国人切勿因此与传教士心生隔阂，仍要与其进行合作，但从中还是可以感受到当时存在于中国基督徒间的诸多不满与质疑。

那么传教士一方对此有何解释？在《教务杂志》等英文杂志上相关内容虽然非常简短，但也有助于我们了解传教士一方的观点。在《本土教牧人员和下次大会》的文章中传教士已经意识到当时的争议，“许多人有一种明显的感觉，他们被排除在外了。”但是他们强调语言不通是这一问题的根源，该文最后指出不应该让中国教牧人员有被轻视的想法，在筹备另一次会议时要充分考虑这个问题。⁴在5月7日晚上举办的告别会上，大会执行委员会主席郭斐蔚（F. R. Graves）也专门解释了没有中国代表出席大会的原因，并强调：“在我们所做和所说的每件事中，我们都在思考如何能够最好地帮助中国基督徒和中国教会。”

《教务杂志》报道没有完整记录郭斐蔚的发言，但认为“大家都清楚他们缺席

¹ Rev. James Vernon Latimer, Morrison Centenary Conference from a Missionary's Standpoint, *The Baptist missionary magazine*, Aug., 1907, p.336.

² 《时评》，《通问报：耶稣教家庭新闻》，1907年第245期。

³ 《论说：西人百年大会之感情》，《通问报：耶稣教家庭新闻》，1907年第247期，第1页。

⁴ Native Ministry and the Next Conference,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May 1907, p.280.

的原因”。或许在当时传教士看来，不论是语言还是其他方面，中国基督徒还未达到参与讨论并决议在华传教事务的程度。但是该文也意识到：“差别和困难不得不面对，但不会始终存在，我们几乎不可能再单独讨论传教士问题了。”¹分歧的存在激励传教士更加重视中国教会与基督徒的成长，进而在此后支持中国基督徒举办自己的大会。

在传教士自身的认知以及中国基督徒的质疑声中，此次大会将是最后一次传教士大会已经成为当时传教士群体的共识。美部会代表团主席提到：“大家都坦率地说，这肯定是最后一次传教士大会了。下次大会将是中国教会自己的会议，那时传教士和中国人将在一个共同的基础上相遇。”²他认为中国基督徒将承担起在自己的土地上传教并维护和发展基督教会的责任，传教士对此充满乐观的期待。女传教士麦美德（Miss Luella Miner）也在有关百年大会的文章中称应该为能干的牧师和中国教会的其他领导人承担更大的责任做好准备，“下一次会议(必须马上举行)将庆祝中国本土教会时代的到来。因为我们培养的这个年轻巨人早已把襁褓解开了。”³

三、登台的主角：广东纪念大会中的中国基督徒

面对上海百年传教纪念大会缺乏中国代表的局面，中国基督徒决意自行组织纪念活动，在华人信徒每月定期集会的上海小公祈会上，有人便提议此事，并拟定于次年九月四日举行华人纪念马礼逊来华传道百年大会。广东籍牧师黄旭昇极力促成此事，他表示“吾深望此会之能底于成也。吾深望中国所有之信徒赞助此会之能底于成也，不然我不知我中国信徒何以为地。”⁴可见其对举办华人纪念大会的期望。因资料缺失，目前对于上海是否曾举行百年祝典以及其中的细节不得而知，但是曾多次在上海参与讨论的黄旭昇将该想法带回，广东

¹ Prominent Thoughts,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Jun., 1907, p.343.

² Professor Edward C. Moore, D.D., "The Centenary Missionary Conference", *The Missionary Herald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July 1907, p.328.

³ Miss Luella Miner, "The China Centenary Missionary Conference", *Mission studies: Woman's Work in Foreign Lands*, Aug., 1907, p.234.

⁴ 《时评》，《通问报：耶稣教家庭新闻》，1907 年第 245 期。

华人百年传教纪念大会得以成行。¹

1807 年马礼逊入华传教时，最初抵达的地方便是广东。1906 年广州各教会便曾举行小型的纪念活动，当时青年会事业正拟推及广东，因此此次纪念活动更多的是借此机会筹建马礼逊纪念堂，更加大型的纪念活动未能提上日程。²

《真光报》在记述广东纪念大会的筹备经过时提到 1906 年广州十大公会曾欲筹集 20 万银元建堂纪念，但因耗资较大，未能如愿筹齐，遂决定在上海百年大会后，于马礼逊入华满百年之日在广东举行庆典。³不过当时对于是否举行庆典似乎存在分歧，在民族主义盛行的形势下，时人多认为“外人传教为其政府所利用以阴行其殖民政策”，在中国举办大会纪念外国人来华传教似有“媚外”的嫌疑，中国基督徒努力在爱国的民族主义者与教徒的身份间寻求平衡。在《真光报》的专题报道中便专程对举办这次纪念活动进行解释，强调“今日之纪念，非纪念英人马礼逊，实纪念中国得耶稣始于英人马礼逊。”⁴1907 年黄旭昇曾提及：“广东信徒旧岁虽有提议，请各省信徒派代会议，以作百年祝典纪念，无奈老成持重，安隐畏劳派，多不主张救主骑驱入京张扬故事，此事暂寝。”可知当时整个社会对基督教与外国势力联系持有疑虑，导致教徒在行事时也不愿张扬，因而当时并没有达成是否举办纪念大会的一致意见。

不过同样是在民族主义的激励下，上海百年纪念大会召开时中国基督徒的讨论和质疑无疑加深了黄旭昇等人自行筹备华人纪念大会的想法。在回到广东后，他便开始积极奔走劝说之前并不主张开纪念大会的同仁。⁵1907 年 7 月 27 日（农历 6 月 18 日）在兴华会礼拜堂举行的各公会联会上，最终决定举办华人庆祝百年传教大会。兴华会本就是由广东教会领袖发起成立的自立教会，在当时颇有影响，入会者众多，联会上推选的纪念大会总协办长廖卓庵便是兴华会会

¹ 黄旭昇：《定期集议华人百年大会（本埠）》，《通问报：耶稣教家庭新闻》，1907 年第 254 期，第 2 页。

² 《传道百年纪念会启（广东）》，《通问报：耶稣教家庭新闻》，1906 年第 205 期，第 3 页；《筹建纪念马礼逊堂劝捐序文》，《真光报》，1907 年第 6 卷第 1 期，第 2-3 页。

³ 廖卓庵：《中国耶稣教百年纪念会记》，《真光报》，1907 年第 6 卷第 8 期，第 1 页。

⁴ 张亦镜：《自序》，《真光报》，1907 年第 6 卷第 8 期，第 3 页。

⁵ 黄旭昇：《羊城纪念马礼逊百年庆典详闻》，《通问报：耶稣教家庭新闻》，1907 年第 266 期，第 23 页。

吏。¹四日后在伦敦会自立会再次集议，由廖卓庵确定筹备组成员，分别为择地部长刘子威²、陈设部长蔡自昭、主理演说部长张立才³、音乐部长余锡生、文件部长劳曰富、招待部长谢恩禄⁴、度支部长黄旭昇。⁵

因是临时起意，广东纪念大会的筹备时间仅有月余，不仅无法请其他省份的代表参加，甚至连所需款项都未能集齐。不过当时的广东基督徒领袖已有一定经济能力，筹备组成员自行凑出七百元用于各项支出。⁶在筹备组的努力下，各项事宜都有序进行。9月5日（农历7月28日）即马礼逊入华前一日，广东纪念大会如期举办。大会会场规模壮观，长40米，宽近27米，高与博济钟塔齐，可容纳三四千人，搭建费时十六日，至开会当天才完全建好。会场内部陈设精致，而且为保证会场安全，筹备组专门安装电灯以防火灾，并请水车公司提前预备。为防到会者不足数，筹备组为每场集会印制了五千份入场券，结果每日到会者络绎不绝，因人数过多有人还想要仿造入场券以渔利，出乎筹备人员的意料。为维护会场秩序，筹备组除安排了专门的招待员外还设有稽察员、纠仪员数人，对于参会人员的言行举止都进行规范。⁷

大会前后共计四天，前三日举办纪念活动，最后一日充做广东基督徒联会的秋季聚会。大会主席每日均不同，分别为美领事波贺劳、岭南学堂国文总教习钟荣光⁸、长老会传教士富利悖，并且请广东政界、绅界、学界、报界、商界、慈善界分日参会。大会期间各项流程紧凑，每日专程请陆军速成学堂军乐队奏军乐，还请教徒、学生鼓琴、读诗、唱歌，并组织与会人员为政府及民教相安、

¹廖卓庵，浸信会牧师，革命派人士，曾在美留学，1902年《真光报》创办，湛罗弼主政，请廖卓庵任主笔，廖邀张亦镜任编辑；1903年任孙中山帮助改组的资产阶级革命报刊《大同日报》编辑；1903年兴华自立会成立，廖卓庵任会吏；民国建立后曾任高要县县长。

²刘子威，伦敦会信徒，1907年冬在佛山轮船上曾发生印度警察踢死中国人命案，多位医学界人士在刘子威医所集议主张华人自立，决定成立光华医社，这是中国“第一间‘民办自教’的西医学校”。

³张立才，浸信会牧师，两广浸信会传道部总巡。

⁴谢恩禄，伦敦会自立会牧师，1904年，谢恩禄提倡自养，刘子威、钟荣光等人多有襄助，后来曾任广州青年会总干事。

⁵《中国耶稣教百年纪念会记：缘起》，《真光报》，1907年第6卷第8期，第4页。

⁶黄旭昇：《羊城纪念马礼逊百年庆典详闻》，《通问报：耶稣教家庭新闻》，1907年第266期，第23页。

⁷《中国耶稣教百年纪念会记：会场形式陈设规则秩序》，《真光报》，1907年第6卷第8期，第7-14页。

⁸钟荣光，广东香山，字惺可，1895年参加孙中山发动的广东起义，1896年加入兴中会，1899年受洗入教，1900年任岭南学堂汉文总教习，1907年被袁世凯密探拘捕，后经营救得脱。武昌起义后任广东都督府教育司长，后任国民党纽约支部长。1928年岭南大学收归国人自办后任第一任校长。

教务及学务、全球教会与中国振兴祈祷。

此次大会最为重要的环节是各项演讲，这些题目都是当时中国基督徒最为关心的内容。第一天由传教士皮尧士演讲“马礼逊历史”、杨襄甫¹牧师演讲“百年后中国教会前途之希望”、传教士湛罗弼演讲“中国民教相安问题”，其后几天的演讲题目分别涉及基督教的教育、文字、慈善以及同风俗的关系，演讲者多为中国教牧人员。²在晚上举行的会议上，分别为谢恩禄任主席演讲“劝戒鸦片”、黄登云任主席演讲“振兴工业”、湛罗弼任主席演讲“改良风俗”，吴尊三任主席演讲“家庭教育”，每晚有五位讲员围绕主题依次进行演讲。³

纵观此次广东纪念大会，可以看到有几个特点：

首先从筹备者和演讲者来看，他们多为广东地区主张教会自立自养的中国教会领袖或在各领域颇具影响的基督徒。他们深具民族情感和爱国热忱，在教内将推动教会自立视为争取国权的一部分，在教外也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努力。其中多位基督徒都与当时的革命人士关系密切，第二日大会主席钟荣光便因被视为革命党被抓刚获释放。在大会筹备过程中也处处体现着中国基督徒的自立意识，筹备组成员不假手于人，而且坚持自行筹款。参与筹备的中国教会人士前后有两三百人，他们在极短的时间内将各项事宜筹备妥帖，这也证明了中国基督徒已经有足够的能力独立承担教会事务。

虽然演讲者中有数位知名传教士，但是他们也意识到了中国基督徒与传教士在此次大会中的“主客”位置。湛罗弼（R. E. Chambers）在大会演讲中表示：“眼前此纪念会已算是自立精神，会场顶上虽大书特书马礼逊先生传道入华百年庆典，我西人并无一人预议，纯是中国教友自办，我得立此地演说，实系中国教友用一张中国耶稣教百年纪念会单柬请来，不请我都不能擅立此地，

¹ 杨襄甫，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往来密切。具体参见：陆丹林《总理的一位师友杨襄甫》，《时代精神》，1944年第9卷第5期，第71-72页。

² 《各讲员演说词》，《真光报》，1907年第6卷第8期，第9-41页。

³ 《夜堂聚集汇记》，《真光报》，1907年第6卷第8期，第41-42页。

盖我辈西人在此事实系客，客非得主人请自不敢孟浪也。”¹他认为传教士在中国所有教堂都是做客，并期望此后中国教会可以逐渐做到完全自立。他在《教务杂志》上也发文介绍此次大会，并对中国基督徒的自立意识大为赞赏。他强调这次大会的筹备始终由中国人掌握，而且没有向外国人请求捐款，尽管有些人自愿提供帮助。²湛罗弼的演讲和文章虽然并不能代表全部在华传教士的观点，但也表明广东地区的教会自立已经达到很高的程度，这为此后全国各地的教会自立运动起到良好的示范效应。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纪念活动中广东地方官员多有协助。在广东基督徒拟建马礼逊百年纪念堂时，两广总督周馥、其他多位地方官员以及侍郎伍廷芳都提供捐款。纪念大会在选择场地时曾计划借河南戏院、博济医局等地为会场，但都因担心参会者太多而作罢，后来巡警局龚廉访得知这是华人自办的大会，非常赞成，并且允许借用官地搭盖大棚为会场，还派兵加以保护。³电灯局在会场照明不足的情况下免费加装电灯，且电费收取数额大为减免。

从参会者来看，广东各界都积极参与其中，会场内每日都人满为患，参会人数超四万人，是当时中国基督教史上最大的集会，这反映了广东各界对待基督教的态度，也有助于扩大基督教的社会影响。通过这次纪念大会，中国基督徒的素质得到证明。大会秩序井然令人印象深刻，也令传教士对中国基督徒发生改观：“西人对于此事，初亦谓华教友程度未至，办理恐未能如法。及获观第一日礼，便交口称誉。不待会事之毕，已撰英文登西报，传遍全球矣。”⁴中国基督徒在很大程度上也扭转了以往“吃教者”的形象。曾参与此次大会的传教士伍赖信（Charles A. Nelson）在文章提及出席者穿着很好，表明这里的基督徒并不贫穷，“事实上皈依者和信徒并不属于真正的穷人，可以肯定的是，在广东没有‘米教徒’。”⁵传教士们对于大会详情的介绍有助于在各西方差会

¹ 湛罗弼：《各讲员演说词：中国民教相安问题》，《真光报》，1907年第6卷第8期，第16页。

² R. E. Chambers, “Chinese Celebration of the Centenary of the Arrival of Morrison at Canton”,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Nov., 1907, pp.626-627.

³ 《张立才牧师二十年前反对传教条约名言》，《真光报》，1927年第26卷第6期，第20页。

⁴ 《中国耶稣教百年纪念会记：情形》，《真光报》，1907年第6卷第8期，第19页。

⁵ Rev. Charles A. Nelson, “Canton’s Celebration”, *The Missionary Herald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Dec., No. 13, December 2019 -150-

与中外传教士心中树立中国基督徒的良好形象。¹

此次广东纪念大会参会者人数远超上海百年大会，而且在广东举行纪念大会的同时，至少还有佛山、香港、新宁、香山、广西桂平大黄江及平南石塘六处也举办了百年庆典，并且都极为热闹，新宁有参会者约八百人，香山参会者约一千二百余人。²中国基督徒如此广泛地开展和参与纪念活动，再次证明了新教入华百年后中国基督徒已经成长。

四、结论

通过上文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在新教入华百年后，中西力量对比出现了明显的变动迹象。在华传教百年纪念活动是一个重要里程碑，它有助于我们观察当时基督教中国化的程度和限度。中国教牧人员追求教会自立，在教会内的话语权不断提升，虽然在上海百年传教纪念活动中，传教士努力营造一种中西融洽的景象，中国基督徒也积极参与各类纪念活动，但是传教士将中国基督徒排除在有关在华传教事务的讨论与决议之外，这一举动无疑伤害了中国基督徒的情感。他们借由广东纪念大会证明了自身的能力和素质，也向中外传教士明确表达了追求自立自主的强烈意愿。中国人在两次百年纪念大会期间的举动写就了中西新教权势建制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一页。

不过，在基督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基督徒走向舞台中央的愿望还面临众多阻碍。广东纪念大会只具备纪念意义，且参与者仅限广东一地，中国基督徒还没有能力独立组织一次商讨教会事务的全国大会。从全国来看中国教牧人员数量还非常不足，教会自养能力有限，西方差会和传教士在教会事务中依然居于主导地位，广东基督徒自费自办纪念大会并不能代表当时整个中国教会的发展水平。教会要实现自立既需要中国基督徒的努力，也需要官方乃至整个社会的支持。清朝各级官员虽然提供了众多帮助，但是面对内忧外患，清政

1907,p.583.

¹ A Native Celebration of Robert Morrison's Coming to China, *The North - 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September 20, 1907;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Oct., 1907, pp.571-572.

² 《余闻》，《真光报》，1907年第6卷第8期，第42-43页。

府无力对中国教会和基督徒提供足够的支持，中国教会自立运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